

## 平城旧曾谖之惊蛰

□ 任翔宇



春天从哪里开始？似乎应该从立春算起，不过我倒觉得，对于秦岭淮河以北，尤其是雁门关外来说，春天，更应该从惊蛰更始。毕竟，七九河开八九雁来的时节里，冻土解封，春雷震震，蛰虫惊而出走，才更像是一个万物萌发的春天。

惊蛰有三候，一候桃始华；二候仓庚鸣；三候鹰化为鸠，皆为春景，桃花红、梨花白，黄莺啼、燕飞来。如今的惊蛰越来越容易被遗忘了，春节后，清明前，不是节假日，正是一年初忙时，惊蛰悄悄地来，无声息地走。而在从前，至少这一天里，我们都会记得，得吃梨。

在包括大同在内的众多北方城市习俗里，惊蛰吃梨是传统的民间习俗。梨因为音同“离”，平日里是很容易忌讳的，一家人吃什么都可以分享，唯独梨，你吃的时候，可以安安静静一个人吃。不过惊蛰吃梨却寓意着和害虫分离，远离疾病。中医朋友说，惊蛰时节，春回大地，气候比较干燥，容易口干舌燥，梨则性寒味甘，有润肺止咳、滋阴清热的功效，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食用。吃梨和吃梨总是不大一样，在遥远的七十年代，从小不怎么爱吃水果的我曾经特别盼望惊蛰来着，老爷子那时候还年轻，可能也正喜欢尝试新的玩法来排遣一成不变的普通日子，惊蛰做一道关

于梨的甜点，于是就成为了这个平凡节气里不平凡的经历。大同好像那时候没有种梨树的，新疆的库尔勒香梨更是到了九十年代我才尝到，大多数的梨，来自山东河北，还有些，来自周边，不过这些往往是些亲戚朋友们带来的，比如代县的金酥梨，原平的同川梨，高平的铁炉梨，祁县的酥梨，那时候矿务局在怀仁管着一个五七干校，五七干校里种了些嫁接的果树，长出来的“苹果梨”，对，就是沈腾在小品里说的那个“苹果柿子李子梨”的苹果梨啊，像梨，但又点苹果味，算是最特别的童年水果味道。再说回甜点，梨子洗净，先切大块，去核，再分成大致相同的小方丁儿，装碗，然后，最特别的一步来了，浇淋上芝麻酱，有时候是花生酱，撒点白砂糖，齐活儿。懵懵懂懂地吃了好多年，等到八十年代末去北京吃过西餐了才发现，那些年在小皮卷、塔寺街、贵儿寺街吃过的这道甜点，其实更应该换一种原料，沙拉酱。换了沙拉酱，这口味才忽然变得正宗了，没想到，自己小时候竟然吃了多年的土味西餐。

八十年代末时候，当我和小伙伴们从一中的校门口把脚蹬子蹬得飞快链子都快冒火星之际，从师校街穿过大西街拐进下寺坡奔向太宁观或者兴国寺的路上，我

们总是齐声哼唱，哼唱的歌儿很多，其中有一首，里面有一句里说，“我的爱是蛰伏的春雷，未曾来到”，大同的惊蛰里，很少有春雷，但是因为这首黄莺莺的《雪在烧》，那个时候总是莫名期待，期待惊蛰的春雷，期待冰雪的轻烧。在南城的大街小巷胡同里穿行的那群愣头青们啊，五音不全或者因为变声而变得粗粗细细极不均匀的嘶吼歌声里，这首歌像是一道奇怪的符，可以让自行车慢下来，也可以让愣头青们仿佛都好像恋爱了，柔情脉脉。

大同地处塞上，物产当然没办法和物产丰饶的江南相比，不过到了九十年代以后，不仅“川妞”这样的四川火锅火爆起来，迎泽街上也有了平日里我们原先都不多见的江浙物产。娶了苏州媳妇，口味多少都有点改变，惊蛰吃笋，也就这样走进了我这个大同人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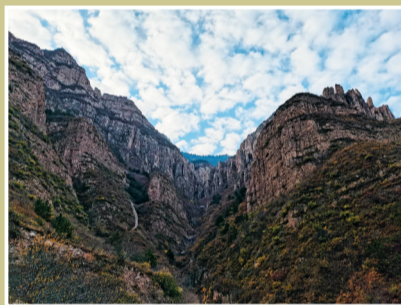
笋，被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拔为“蔬食中第一品”。笋分多种，按时间顺序可有冬笋，雷笋，春笋。冬笋蛰伏土下，于深冬上市，口感鲜嫩，春笋于春分时破土而出，鲜爽脆嫩，比冬笋稍略多点纤维感，《舌尖上的中国》里曾专门提到过一种笋，雷笋，据说闻雷而生，需快烧速炒，才不负这节气里最鲜的滋味。在文人们看来，食笋和吃蟹是行风雅之事。吃货苏东

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后来专门到宜兴的竹海小住，油焖春笋、竹笋烧肉等家常菜都是吃笋的招牌菜，不过，最令人称道的还是那一锅腌笃鲜。“腌”指的是咸肉和火腿，“笃”是苏州话，意为小火炖煮，“鲜”则是指鲜肉和鲜竹笋，将多种荤素食材炖煮成一锅鲜，每一口汤都带着竹笋破土而出的清香鲜美无比，食之齿颊留香。在大同吃腌笃鲜，是在暖气未停、春风初拂的时间里，非常奇特的一种饕餮享受。这享受不仅要感谢当今物流的便捷，还要感谢中国在这个时代里的迎春勃发。

惊蛰仿佛是一个信号，告诉我们更应该开始做些什么。这个季节里吃点什么也好像是个证明，证明我们打算在这变换的季节里用一次口齿的满足，来强调对于这信号的回应。这样的回应持续了成百上千年的回应。这样的回应持续了成百上千年的回应。每个城市风俗和每个家庭的习惯总有根源，也总有流传。



## 随手拍大同



早春

玉芹 兰子 摄

## 百年变迁的历史回望



回溯大同铁路史，1914年大同城北响起呜呜的汽笛声，喷着浓烟的蒸汽机车，拉着一节节车厢从古城侧、御河畔隆隆驶过。大同铁路在经历了蒸汽机时代、内燃机时代、电气时代后，于2019年底跨入了高铁时代。

此时，我的思绪竟又穿越回蒸汽机车时代的旧时光中。对于我们那代人来说，火车并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它还收纳着人们精神世界里难忘的时代记忆与丰富的个人情感，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沉甸甸的梦想。一种跟情怀相关的东西，难以忘怀。

我的童年是在铁道边度过的。那时候雁北行署统管13个县，只有5个县通火车。那些远离铁路的地方交通闭塞，信息不畅，连火车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那年，我去桑干河南边的姥姥家，小伙伴们听说我们那里通火车，好奇地问我：“火车用几头牛拉的，刮风下雨怎么办？”这么傻冒的问题差点笑掉我的大牙。

我从小听着火车高亢悠长的汽笛声长大，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附近的村民们也习惯了听着汽笛声安排生活。火车准时准点到来时，就会传来长鸣的汽笛声，这声音可以穿越五六里地，成了附近村庄的报时钟。清晨曙光初现，远处传来的汽笛声划破了村庄的宁静。母亲催促我：“火车过来了，赶紧起床！”正午时分那趟票车（客班车）到来的汽笛声响起，下地干活儿的村民就知道快12点了，该收工了。

最让村民觉得实惠的是，铁路每月定时安排一节装满日用品的车厢，为沿线职工送福利，乡亲们也跟着沾了光。每当听到高昂的汽笛声响，人们戏称大货郎来了。于是，像赶大集似的呼朋唤友，三五结伙地提篮去采买。

那个年月，村民们沾了铁路不少光，也

为铁道建设出过力，做过贡献。在战争年代，民兵们为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利用夜色掩护破坏铁路，将铁轨卸下，深埋地下或扔到井里。建国初期，政府号召附近村民帮助寻找那些丢弃的铁轨。一声号令，村民们热情高涨地投入到寻宝中。他们找回不少铁轨，还有阎锡山时期的小铁轨，政府都给予了奖励。后来，为了解决铁路线上枕木不足的问题，政府又号召村民捐献大树。乡亲们以同样的热情踊跃捐献，我家也将院里生长的两棵大杨树捐了出去。我和小伙伴还特意跑到铁道边儿，异想天开地想找到我家那两棵树做的枕木。

生长在铁路边的孩子对火车有着超乎寻常的别样情感，似乎对这个庞然大物永远看不够。放学后我们经常绕道回家，为的是去火车站看司炉师傅往机车锅炉里一锹一锹地加煤，红红的火焰照亮了师傅黝黑的面庞，有种神圣的美感。还饶有兴致地观看站上工作人员在水塔边往火车注水，直到火车拉响嘹亮的汽笛，喷吐着长长的白烟，“哐当哐当”地驶出车站。就这样无数遍地看着看着，心中就滋生出有一天自己也能当上火车司机，驰骋万里铁道线。

多少年后，这群小伙伴中有人梦想成真，当上了火车司机，还有一位成长为车站站长。我弟弟中学毕业后，被安排到内蒙古建设兵团，恰逢铁路到兵团招工，他也如愿以偿穿上了铁路服。

百年弹指一挥间。过往岁月的回忆虽然甜蜜而温馨，但难掩对高铁时代的向往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当“子弹头”代替了“绿皮车”；当高铁300—350公里的快时速，代替了蒸汽机35公里的慢时速；当大同与首都北京、大同与省城太原实现了比邻而居，进入了“同城时代”时，满满的幸福感又在我的心底荡漾开来……宋元林